

当代儒学研究的诠释学转向

深圳大学教授 景海峰

儒学史的现代书写

当代的儒学研究是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的。有义理之儒，近于哲学；有文史之儒，重在文献考据；有辞章之儒，致力艺文；也许还有经世之儒，以政法、工商为左蠹。在林林总总的眼界和方式中，文献总是最基础的，材料是硬道理，所以“做”儒学，首先就是从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文字、图像、遗迹等实存物入手，已经存在的记录和构成了可叙述性的历史片段，便成为儒学话语展开的前提。在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中，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历史意识的“前在”状态是保证叙事有效性的砝码，所以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在当代学林中便获得了天然的优位，对于传统的儒学资源来说，更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儒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儒学史的研究，当时一种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理解是，儒学已经成为历史，所以研究儒学就只是研究它的历史。在当代新儒家出现、新儒学兴起并为学界所关注之前，这似乎已是常识，因为所有的儒学叙事几乎都是以历史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大家对儒学的理解也主要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的渠道而得到灌注和滋养的。儒学史的现代书写，在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体系土崩瓦解之后便自然展开了，作为已经“离场”的陈迹和被描述的历史对象，儒学发展的历程就成为了一部编年史，从可以考论的先秦时代一直延续到晚清。

但历史学的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像它自诩的科学宗旨那样清晰和确定，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中，对儒学历史的叙述充满了各种简约化的阐释因素，所选取编排的材料，也经过了有意识的挑拣，按照对象化的所谓“客观”要求，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现代解释。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对于儒学的角色判定和功能说明，是带有强烈的解构性和颠覆性的，社会环境中到处弥漫的政治色彩和无休止的批判活动，又使得这一编年式的叙述工作也相当的支离破碎和极其的不稳定。在种种科学方法和理论假定的前提下，历史材料的挖掘、清理、勾连和解读，以及基于现代思想观念的究元决疑，让儒学发展的叙事过程充满了已解释的内容和未解释的内容的混杂，同时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也堆积在一起，加之各种解释系统的内容叠加和相互融合，就使得儒学的历史叙述始终处在一种模糊和漂移的状态。

诠释的儒学嵌入现实生活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历史学研究所追求的客观性存在着“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的危险，往往因偏执于所谓的真实性而自以为是、囿于一孔之见，其自持的确定性反倒可能会陷入到凝固化、拘泥乃至荒谬之中。历史不是板结的色块与图画，而是人的丰富精神活动的连续性累积，对于历史的理解需要当代人的“精神的当下或在场”（伽达默尔语），通过对文本等历史传承物的解读和体味，每个生命个体与过去的历史情景之具体性有所契合，以通贯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流中。历史绝不是各种事件的简单堆积，对于历史的解释更不是僵固的、表象的描述，而是需要不断返回到浅近的传承物的背后去，用自身的切己感知去理解和挖掘个中的意义，以获得真实的历史存在感。所以，深刻的历史研究不应只是陈述事件，对已经存在的文本做白描式的展示，而应该解读其附属的意义，在有限的文字记述和浅显易识的表象背后，捕捉和领悟到人类精神活动的内涵与真谛。这样的历史理解，不仅是以所谓的“客观性”为标示，也需要避免陷入僵固的简单确定性之中，其目标是重在不断的意义发掘活动和创造性的叙事过程，以启迪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换言之，诠释学叙事的历史画卷应该是灵动的、活泼的，并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

有一种内在的嵌入感，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往来。

按照诠释学的理解，历史不仅是可叙述的，而且也是不断重构的过程，并没有一个既定的、凝固的历史。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上卷，第384-385页）亦即历史是在理解中建构的，也是在理解中呈现的，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儒家，它的历史更应该是如此。可诠释的儒学史，其得以显现和准确把握的基本中介，即是历代儒者所存留下来的著作，通过对这些文字的阅读、体悟、理解和阐释，我们和古代人的心灵便发生了交会与碰撞，在不断的视域融合机理下，加入到“效果历史”之生成的无尽环节当中去。正像诠释学家特雷西所说的：“经典性文本透过其效应史向外延伸，最终被另一时代的另一解释者所接受。解释者则不断向前拓展，不断穿越对经典文本的前在理解和既定期待。文本和解释者相互作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无从避免。”（《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这样，所谓儒学的历史就如此呈现出来了，我们所说的儒学发展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从经典诠释来解读儒学的历程，它就不限于编年史，而可能是情景化的、模拟化的，亦即超越了事件本身的处境，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普遍性。

受哲学诠释学之“效果历史”观念的影响，当代的儒学研究已经逐渐摆脱机械历史观的羁绊，而更加注重儒学的活性与当下性，对历代儒者所存留之文本的阅读也早已超离了历史文献学的心态，不只把它们看作是过去的遗产和僵死材料，而是可以叩问、可以交谈的心灵之友，通过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来寻求人类精神持续绵延的意义，体悟和印证我们当下的实存感受。儒学研究的这一诠释学转向，使得儒学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眼界和框架之中，而更多地包含了叙事与重构的意味，儒学研究也就不再仅仅是儒学史的研究了，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拓展出了可能的空间。